



《南开话语研究》系列丛书 总主编 田海龙 丁建新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形象： 英国电视对华报道话语分析

曹 青 著

Chinese Image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British TV Reports on China

Qing Cao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话语研究》系列丛书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形象： 英国电视对华报道话语分析

曹 青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形象:英国电视对华报道话语分析 /
曹青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8
(《南开话语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310-04249-4

I. ①全… II. ①曹… III. ①国家—形象—研究
—中国②英语—新闻语言—话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D6②H31③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3049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4.75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

定价:4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南开话语研究》系列丛书

总主编

田海龙（天津商业大学）

丁建新（中山大学）

《南开话语研究》系列丛书视话语为社会实践，倡导对话语的跨学科研究。出版的专著和主题文集探索话语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致力于认识话语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丛书也出版有助于进行话语研究的读本。

《南开话语研究》顾问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横排）

曹 青（英国杜伦大学）

陈新仁（南京大学）

Paul Chilton（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窦卫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杜金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纪玉华（厦门大学）

李 艺（南开大学）

刘承宇（西南大学）

苗兴伟（北京师范大学）

欧阳护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钱毓芳（浙江传媒学院）

施 旭（浙江大学）

王晋军（云南大学）

王 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王振华（上海交通大学）

Ruth Wodak（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吴宗杰（浙江大学）

辛 斌（南京师范大学）

尤泽顺（福建师范大学）

张 青（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Nankai Discourse Studies Series

General Editors

Tian Hailo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Ding Jianx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Nankai Discourse Studies Series (NDSS) views 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 and promot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It publishes monographs and themed volumes that explore the complexity of discourse in relation to society, particularly to the 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also publishes introductory textbooks that prepare students for research on discourse studies.

Advisory board (in alphabetic order)

Cao Qing (Durham University, UK)

Chen Xinren (Nanjing University)

Paul Chilton (Lancaster University, UK)

Dou Weili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Du Jinb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Ji Yuhua (Xiamen University)

Li Yi (Nankai University)

Liu Chengyu (Southwest University)

Miao Xingwe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Ouyang Huhu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Qian Yufa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Shi-xu (Zhejiang University)

Wang Jinjun (Yunnan University)

Wang Zhenhua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Ruth Wodak (Lancaster University, UK)

Wang Wei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Wu Zongjie (Zhejiang University)

Xin Bi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You Zeshu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 Qing (Arizona University, US)

总 序

话语在我们的研究中不仅指语言的运用，而且被认为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与社会事实存在着塑造和被塑造的辩证关系。在当下社会，新媒体不断在人们生活中渗透，并与控制交际内容和方式的权力交织在一起，更使得话语在构建社会事实中的作用凸显。因此，我们认为，话语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不可忽略的研究课题。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话语成为社会学家、哲学家以及语言学家的关注所在。诚然，不同领域对话语的关注有所侧重，但是这些侧重也造成一些偏颇。例如，社会学传统的话语研究缺乏对话语进行细致的语言学分析，而语言学传统的话语研究则喜欢对话语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很少将这些分析深入到政治和社会的话语层面。

《南开话语研究》系列丛书提倡对话语的跨学科研究，重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如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如社会学、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管理等等）。丛书旨在探索话语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特别是认识话语在中国社会政治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南开话语研究》是一个开放的丛书系列，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用中文或英文撰写的专著和主题文集，也出版有助于进行话语研究的读本。我们期待着这个系列丛书能够对话语的跨学科研究有所推动，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有所贡献。

丛书主编 田海龙 丁建新

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

Series Preface

Discourse is seen as an element of social practice, which is not only socially shaped but also socially shaping. The dialectics of discourse and society makes it possible that discourse becomes the replica of reality, and this is all the more salient in the post-modern society where new media works together with power over and control of the ways and sources of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of discourse, we believe that discourse is one of the concerns of social sciences.

And indeed this was the case. Discourse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ociologists, philosophers, as well as linguists. 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note that they have different shades of emphasis, it is important to see the side-effects of these emphases. For example,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of discourse studies lacks detailed linguistic analysis of discourse, and the linguistic tradition often limits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within the intra-structure of the discourse, rarely relating this linguistic analysis to the discourse facet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Nankai Discourse Studies Series (NDSS) favour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discourse, that is, it highlight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inguistic research methodology (e.g. discourse analysis, sociolinguistic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orpus linguis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with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sociology, philosophy, history, economics, law and management. The book series aims to explore the complexity of discourse in relation to society, in particular, to the 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Nankai Discourse Studies Series (NDSS) is an open book series by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It publishes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monographs and themed edited volumes. It also publishes introductory textbooks that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research on discourse studies. We expect this series to facilitate 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sperity of social sciences.

Series editors: Tian Hailong and Ding Jianxin

引言

本书采用叙事及话语分析研究方法,观察1980年至2000年间在英国播放的有关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见附录一)。重点关注两方面:一是分析这些电视纪录片文本,解析其叙事结构、话语结构及权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二是探讨西方自我文化意识与中国形象塑造之间的关联。本书研究目的是探讨英国媒体通过哪些语言结构、叙事技巧、话语手段在电视纪录片中构建“中国形象”,及这种形象如何在西方文化语境、价值观念、历史传统、权力关系及利益格局中产生意义,与受众建立共识、确认身份、强化其价值观。至于传媒报导的对与错、好与坏、积极或消极、正确或谬误、赞美或鞭笞,并不是本书关注重点(见第一章)。“英国电视纪录片”指英国地面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包括与国外制片公司合作或由国外制片公司独立摄制的纪录片。所选纪录片只局限于普通地面电视频道播放的电视片,不包含卫视及有线电视频道节目。这些地面电视台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电视一台”(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缩写为“BBC1”),“英国广播公司电视二台”(缩写为“BBC2”),“独立电视台”(Independent Television,缩写为“ITV”)及第四频道电视台(Channel 4,缩写为“C4”)。这些电视纪录片在本书中只用作分析研究的语料,其中一些片名和内容的表述并不代表作者的观点。

本书涉及重点概念有“形象”及“再现”,下面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作一说明。根据威廉姆斯^①(Williams, 1976: 158-9)及奥萨利文等人(O'Sullivan *et al*, 1994: 144)的定义,“形象”一词有三方面意义:第一是物理含义,指通过照片、图片或电视等形式展示现实世界;第

① 作者名在括号内以英文给出,便于读者在书后“参考文献”中找到出处。

二是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创造出的意象；第三是大众传媒塑造的公众形象。第三种意义是新近出现的，指大众印象、公众信誉、大众亲和力，而非对现实一丝不苟的反映。本书对“形象”一词的定义与最后一种含义相似，指传媒以特定方式报导中国，影响受众，给受众留下的印象。本书所用“再现”的含义也以威廉姆斯（Williams, 1976: 269）定义为基本依据。传统意义上的“再现”指视觉上的“复制”，特别是视觉艺术对现实的表现；而其另一意义则指社会对现实的反映、反观或反思，并以多种形式传播，如一首诗歌、一本小说、一部话剧、一篇报导、及一场演讲等，本书对“再现”的定义及使用仅限于威廉姆斯的第二种含义。

为让读者更好理解语言如何通过叙事产生意义，本书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将语言意义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联系起来（Barthes, 1977c; Chatman, 1978; Silverstone, 1981; Hall, 1984; Kozloff, 1988, 1992）。本书认为话语层面的语言意义与社会层面的权力关系是同构的，每篇文本都包含社会意义及政治意义，而社会政治意义也必定反映于话语之中（Hall, 1984; Nichols, 1991; Fiske, 1992; Curtin, 1995），即话语是社会政治权力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

电视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是一个重要话语空间，在此空间内知识得以重构，权力得以行使，形象得以塑造。本书借鉴普罗普（Propp, 1968）、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 1963, 1964, 1977, 1995），及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 1981, 1983, 1984, 1986）等人叙事理论，以此为解构纪录片的基本概念框架，并将传媒叙事看作是话语生成的有效工具，是纪录片形象建构的话语实践。本研究对电视片分析以文本为主，画面为辅，视觉分析以巴尔特（Barthes, 1977a, 1977b）菲斯克及哈特利（Fiske and Hartley, 1978）符号学分析模式为主要方法。话语理论则以福柯（Foucault, 1972, 1980）的知识与权力同构学说为基点，以建构论视角为框架，将传媒“再现”看作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话语实践，这些理论及研究方法将在第二章详述。

本研究语料选自1980年至2000年间播放的英国电视纪录片。这二十年间正是中国形象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阶段。经过十一届三中全

会,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1979年邓小平访美在西方广泛树立了积极的改革形象。因此,1980年后西方对中国报导与以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1980年英国十二集大型文献纪录片《龙之心》开镜,迄今为止该系列片仍是西方耗时最长、耗资最大的中国纪录片。另外,由于到中国拍片的限制,1980年前西方关于中国的电视纪录片极少,而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英国关于中国的电视纪录片骤然增加。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中国后,中英关系迅速好转,到了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即,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发生巨变,这一切促使英国对华报导视角发生重大变化,使英国传媒中国形象大幅改观。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正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且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拉动着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因而,语料所涵盖的二十世纪最后20年是西方中国形象重要历史时期,恰好与中国两个形象阶段相重叠,即“第二仁慈期”(1980—1989)与“第三失望期”(1989—2001)(详见第一章)。这两个阶段中国形象之间反差极大,形成鲜明对比;前一阶段形象积极,后一阶段形象消极。与日常新闻报导不同,电视纪录片是对重大事件的深度报导,投资大,制作周期长,播出时间不固定,基于这些特点,语料须时间跨度大,涵盖面广,这样得出的研究结果更有意义。

以电视纪录片中的历史片作研究重点基于如下思考:其一,报导历史需要对中国做深入了解,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与西方社会作比较,这恰好体现了本研究的目的,即在跨文化视角下观察西方媒体中国形象的塑造。其二,历史是个宏观角度,在历史视野下可看清中国形象整体,而不只局限于诸如教育、医药或宗教等单一侧面。其三,分析不同纪录片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再现,可梳理报导中国的基本形态或模式。其四,历史片是语料收集期重要纪录片样式,可为本研究提供充分原始资料作文本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语料是英国电视媒体对华的报导,反映的是西方视角、观念及价值观,这也体现了本研究之必要及价值。本书着眼于西方对中国的所思所言,所作所为,探究其文化肌理、价值脉络、历史渊源、现实考量。另外,以跨文化眼光作为研究视角也可跳出自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中国形象：历史、结构与视角	1
1.1 中国和西方：关系与形象	1
1.2 报导中国的主要视角	7
1.3 现代性观念与传媒“宏大叙事”	14
第二章 电视叙事结构：再现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18
2.1 叙事功能	18
2.2 纪录片话语实践	25
2.3 叙事分析模型	33
第三章 中华文明的形象	36
3.1 儒家传统	37
3.2 鸦片战争	48
第四章 再现民国时代（1911—1949）	61
4.1 国共之争及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冲突	62
4.2 1949 的意义	73
第五章 《通往乐土之途》系列片案例研究	79
5.1 叙事分析：神话式及模仿式	80
5.2 话语分析：“技术”概念的建构	86
5.3 视觉形象分析	90
第六章 话语策略与权力关系	101
6.1 文本现实的建构	101
6.2 “越轨”与“他者”	107
6.3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形象	108

参考文献	111
附录一 英国有关中国电视纪录片, 1980—2000	121
附录二 受访者名单	128
附录三 普罗普 31 个类型化角色	129
附录四 《通向乐土之途》第一集: 和谐的代价	131
附录五 《通向乐土之途》第二集: 发明进步	150
附录六 《通向乐土之途》第三集: 财富与权力之梦	169
附录七 《通向乐土之途》第四集: 猫的颜色	188
附录八 《天命》	207

第一章

中国形象：历史、结构与视角

1.1 中国和西方：关系与形象

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命运在二十世纪里跌宕起伏，与西方紧紧交织在一起。鸦片战争（1840—1842）将中国强行拉入了一个残酷、陌生、危机四伏而又新奇、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时代和新世界。对中国人而言，与近代西方的交往是“百年屈辱”（1840—1945）。被深深刺痛的民族自尊心导致了“受害者情结”的产生，这种情绪根深蒂固，挥之不去，成为中国近代史学最显要的特征。受害者情结的历史观强化了国民悲情意识及道德义愤，使中国人对近现代西方认识往往定格在鸦片战争上。这种情感定位渗透于近代各类话语之中，包括中西学的体用之争（1840—1911）、国民革命理论（1911—1949）、马克思主义学说（1949—1976）及当代民族主义思潮（1978改革开放后）。而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西方又是财富与实力的象征，国富民强，建设现代化国家是中华民族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因此，中国对西方的态度纠结而复杂，既鄙夷又钦佩，既怀疑防范又学习效仿。可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的评价毁誉参半。

与中国的纠结不同，虽然西方对近现代中国亦持形形色色的印象，或曰形象，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以负面为主。乾隆帝被看成是个夜郎自大、愚昧无知的昏君。十九世纪的中国因拒购欧制品，被视为“未开化”、“无进步之观念”，“无视欧洲之强盛”，并给中国贴上“保守”、“落后”、“无理性”、与“不可救药”的标签。鸦片战争后，中国备受

蔑视。那种沐浴着儒家圣哲光环、统治着因《马可波罗游记》笔下的“华夏”而风靡一时的辉煌“中央王朝”，在十九世纪的西方黯然失色。十八世纪欧洲贤哲们所盛赞的中华文明的典雅与尊贵也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中国被黑格尔描绘成“无历史”的国度，被视为木乃伊般、恒久不变、被时间遗忘的地球黑暗一隅，就连看好无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也传承了黑格尔的观念，认为中国可悲地陷入了“东方暴君政治”及“亚细亚生产方式”泥潭而不能自拔（Mackerras, 1999），“迫切需要”欧洲殖民入侵，并坚信只有欧洲才能给中国带来“进步”，如有必要，诉诸武力亦无妨。

然而，尽管遭受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最终并没有被西方所吞噬、同化，沦为殖民地，因而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中国从未被西方所征服、所“拥有”及掌控。纵观世界，南亚次大陆印度文明，中东北非伊斯兰文明，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土著文化多受欧洲列强殖民或因文化渗透而日渐式微，唯中华文明在几世纪西方殖民浪潮中挺立，虽百孔千疮，踉踉跄跄，但并未轰然坍塌，使地球“变成平的”。因此，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之于西方，仍是一片未知领域，一片具有“神秘感”的国度。它的诱惑源于它的陌生、广袤而深厚，及由陌生而产生的疑惧、困惑及恐慌。这种神秘与诱惑，深奥与困扰与中华文化坚忍负重的特质密不可分，更与西方在近现代史上所扮演主宰者角色，及以“现代性”观念对整个世界进行“重建”紧密相联。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终于摆脱了外部束缚、获得民族独立。此时，正值世界范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势不两立、严重对垒之际。对大多数普通中国人而言，一九四九年新生的共和国是战争、饥荒、及“百年屈辱”时代终结的象征。而在西方眼中，中国不过是那一年败给了“共产主义”，并再次“倒退”到自我封闭状态，神秘文化面纱之下的中华文明又被赋予了另类意识形态之敌的形象。中国的社会主义引发了新一轮对“红色恐怖”蔓延的惊慌，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界也悄然刮起了阵阵将社会主义乌托邦浪漫化之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这一转

变恰好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暴风骤雨般的戏剧性变化同步。在这期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反恐战争”爆发,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形象也随着国际政治剧变而跌宕起伏,随着国际经济关系频繁洗牌而左摇右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西关系“蜜月期”迅速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冰冷关系所取代。然而,九十年代西方传媒中的中国“贱民”形象只是昙花一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确立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新地位,西方经济与中国经济形成互不可少的依存关系,以人权为核心的中国负面形象渐渐被题材越来越广泛的报导所淡化,并逐渐转向新关注点,如能源、环境及中国在非洲投资等问题。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西方媒体的中国形象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以2001年中国“入世”为标志的“失去尺度期”。这一以经济事件(中国“入世”)拉开序幕的“新时期”有如下特征:西方传媒已无法以明晰、固定而狭隘的尺度考量中国,权衡利害,组织话语,彰显意义,进而“再现”中国。过去那种简单明确的审视中国的模式已不复存在,这是自冷战来不曾有过的现象。冷战时期传媒报导的尺度是意识形态,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尺度是中国为西方对付苏联的准战略同盟,而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意识形态尺度的回光返照。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入世”后的中国既非西方意识形态之敌,亦非欧美战略盟友,更不是西方自由民主阵营中的一员。在经济方面,西方却与中国的利益密不可分,不仅牢牢捆绑在一起,且利益交织越来越深,不可逆转。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形态日益彰显,经济实力已渐渐转化成政治实力,对有着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的西方而言,中国是当前与未来的竞争对手,在资源有限、越来越拥挤的地球上,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国对事实上主宰世界的西方形成实实在在的压力,种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决定了西方媒体中国形象的多面性、复合性、脆弱性及不确定性。这个“新时期”中,西方媒体中国形象无法完全以所谓“正面”或“负面”的尺度去评判考量,其基调是灰色的,既无九十年代的批评排斥,亦无八十年代的认同嘉许。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模糊的“灰色”形象反映了二十一世纪中西关系演进过程中的微妙、复杂、及日益重要的关系。

在《时代周刊》一篇题为“形象危机”文章中，中国外部形象被描述成“承载太多的怀疑与误解”。该文作者认为，“中国这个出了名的对外界漠不关心的国家对自己外部形象现在非常关切，这实属罕见”（Ramo, 2006）。中国越来越关注自身国际形象，对外界评论更为敏感。在外交层面，中国展开大量积极活动以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在话语层面，中国解释自己的“和平崛起”并发出“和谐世界”倡言。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浓墨重彩的文化形象。然而，这不过是中国自身的努力，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对华看法并未因传媒频频曝光而大幅度改观。冷战证明，战略利益冲突及认知偏差会产生怀疑与恐惧。利特尔（Little, 1995: 63）认为，人们常把二战后世界基本特征看作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垒，这种观念左右了冷战时期的政治话语。然而，尽管意识形态分歧严重，理解冷战最佳方式则是将其看成大国间实力的较量，并从两大军事集团力量平衡这一角度去观察（Little, 1995: 63）冷战的成因。目前，以意识形态看中国早以不切实际，中国正处于深入发展及变革中，正在探求自身文化认同及重建与国际形象定位与传播。更重要的是，中国正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尽管如此，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变化仍感忧心忡忡，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依存不断深化，中西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尽管目前难以估量中西关系新结构、新模式对中国形象有何影响，但两者间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通常认为，观念与形象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维度，是冲突与和平的关键因素。在公众层面，大众传媒对塑造公众对华认识及对华态度至关重要，了解中国形象的产生、传播及接受过程是理解中西关系重要一环。形象与现实是一对永恒的矛盾统一体，二者不可等同又相互依存，但在传媒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人们往往通过前者认识后者，后者也往往被等同于前者。在现代社会，“形象”一词含义颇多，形象常被理解为商业品牌，即“可感知的声誉”（Williams, 1976: 158）。“形象”一词从“视觉再现”到“公众对现实的印象”（O'Sullivan *et al*, 1994: 144）的演化与“再现”一词由艺术领域“精确复制”演进到文化研究

中的“再现”是同步的。哈特利(Hartley, 1992: 265)将“再现”理解为通过反映现实而建构“抽象意识形态”过程。在霍尔(Hall, 1997: 17)看来,“再现”的功能是“借助语言使大脑中的概念产生意义”。不过,哈特利和霍尔均沿袭威廉姆斯的观点,将“再现”视为当代社会文化进程中的“政治建构”,“再现”是文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威廉姆斯所区分的“再现”两方面意义,即“精确再现”及“社会建构”,与文化研究及中国形象研究的两个重要视角相关。霍尔(Hall, 1997)强调,再现是借助“概念图谱”建构社会文化的一种模式,所谓“概念图谱”即某文化所特有的知识结构、历史传承及概念体系。只有共享相似的概念图谱,人们彼此间交流才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可理解为“意义共享”、或“概念图谱”共享。然而,在跨文化背景下,不仅存在着不同的概念体系,且组织、分类及整合知识体系的方式也有所不同(du Gay *et al.*, 1997)。因此,再现中国时西方只能在西方“概念图谱”内徘徊,建立价值坐标,寻求意义。简言之,西方只能以自身概念体系解读中国。因此西方传媒总是在西方概念与范畴内传达“他文化”的意义。同样,西方受众也只能通过西方概念图谱理解有关中国的“故事”。

尽管如此,西方概念图谱生发出来的中国形象也因时而异。艾萨克(Isaacs, 1958: 71)首次记录了西方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轨迹,而后莫舍(Mosher, 1990: 20-21)又进一步补充了艾萨克的中国形象演变史。二人在考察西方对华态度变迁后得出如此结论:随着时间推移,西方对中国印象呈钟摆式起落,周期大致与西方对华政治态度同步。

艾萨克模型:

(阶段1) 敬重期(十八世纪)

(阶段2) 蔑视期(1840—1905)

(阶段3) 仁慈期(1905—1937)

(阶段4) 赞赏期(1937—1944)

(阶段5) 失望期(1944—1949)

(阶段6) 敌意期(1949—)